

华人史论文
Malayan Chinese History

马来西亚独立前华文小学 华文教科书的出版与其思想内涵

Public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Pre-Independence Malaya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郑兰珍
(CHANG Lan Chin)

摘要

立国之本, 在于教育。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元素之一, 亦是教育最重要的工具, 其内容的色彩与偏向, 往往左右学生的思想观念, 影响甚为深远。1904年, 自马来亚创办第一所新式学校以来, 学校即选用由中国编纂和出版, 同为中国学生所采用的教科书。1930年代, 中国特地为南洋华侨学生编纂和出版富有南洋色彩的教科书。1930年代中期, 教科书逐渐走向由中国编纂, 在本地出版的分际运作模式。无论是由中国包办编纂出版, 或由中国编纂, 在本地出版的教科书, 皆以灌输中国意识为宗旨。1952年, 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接纳《方吴报告书》的建议, 开始着手重编华校教科书。1950年代, 马来亚朝着自治建国的道路迈进, 为了培养华人子弟以马来亚为效忠国的思想, 教科书的编纂注重灌输本土意识, 编纂展现“马来亚”色彩的教科书。本文将为马来亚独立前华文小学华文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进行梳理, 从各年代教科书的出版社、特点、思想内容等进行历时性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 马来亚独立前华文小学、华文教科书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crucible of nation building. Textboo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school education. It is in fact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tool. Its contents, ideas and orientations often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In 1904, the first "new-style" Chinese school was established in Malaya. Its textbooks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similar to those used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hina. In the 1930s, textbooks oriented towards Nanyang were specifically compil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for Nanyang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mid 1930s, textbooks were still compiled in China but published locally in Malaya. However, their contents continued to manifest a strong orientation towards China. In 195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tarted revising Chinese school textbooks as recommended by the Fenn-Wu Report. In the 1950s, Malaya was seeking for self-government. In order to inculcate a sense of loyalty towards the nation among the Chinese, textbooks were revised to invoke local awareness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a Malayan orien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used by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during the pre-independence era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ir publishers, special features and ideological contents.

Keywords: Pre-Independence Malaya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一、前言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可说是东南亚，甚至是两岸三地以外，发展得最完整的海外华文教育体系（Tan Liok Ee 1997；林水椽 1998：244；李志贤 2001：18）。马来亚华校新式教育发轫于 1904 年。¹ 新式教育兴起之初，新式学校在中国清廷、康梁维新派，以及革命派党员的呼吁和鼓励下逐渐发展起来。在新式教育开始之前，马来亚的华文教育是以私塾教育形式经营。从 19 世纪初叶到 20 世纪初期，私塾教育前后至少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

马来亚新式华文教育创办时，属于中国教育的一环，其学制、课程，以至教科书，皆以中国为典范，师资亦多来自中国。中国有“教科书”一词，大概始于光绪初年。光绪二年（1876），在中国设置学堂传教的基督传教士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的书籍，乃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负责编纂算学、泰西历史、地理、

宗教及理论等书籍，供教会学校采用，并且赠送各教区内的私塾以为参考。“教科书”一词，乃卒以传开（郑良树 1998：348）。

由于马来亚的教科书历来不被藏书家和图书馆重视，故多已散失，造成搜寻教科书有相当难度。为了搜集这些散失的教科书，笔者进行田野式搜寻。至目前为止，笔者分别从槟城孔圣庙中华中学、新加坡华裔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宗乡总会文史资料中心等，搜集了约 130 本小学华文教科书（见附录一），出版年份介于 1904 年至 1957 年。此批教科书涵盖各个年代，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香港商务印书馆、新加坡联营、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世界书局、新加坡上海书局、新加坡南洋书局等编辑出版。

从马来亚新式华文教育创办至马来亚独立期间，华文教科书在编辑出版及思想内容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本文尝试为马来亚独立前华文小学华文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进行梳理，从各年代教科书的出版社、特点，以及思想内容等进行历时性分析和比较。

二、教科书的编辑出版

本文首先将“华文教科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载体，以历时性分为三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 年至 1911 年，以马来亚第一所新式学校创办为上限，探讨马来亚侨校所采用的晚清国文教科书；² 第二阶段：1912 年至 1949 年，以中华民国成立为分水岭，考察民国时期侨校所采用的国文或国语教科书；第三阶段：1950 年至 1957 年，马来亚于 1957 年独立后，教科书编纂已全面马来亚化，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故设为下限。

如前所述，20 世纪初，马来亚新式华文教育属于中国教育的一环。1904 年至 1911 年，马来亚侨校采用晚清国文教科书。民国以前，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唯一一家有计划推出成套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几乎独占了教科书的市场。参与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蔡元培等，皆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商务教

科书的品质可谓非同一般。马来亚侨校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文教科书，如下表一：

表一：1904-1911年马来亚华校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一览³

出版年份	教科书名称	全套册数	编纂者
1904	最新国文教科书（初小）	十册	蒋维乔、庄俞
1906	最新国文教科书（高小）	八册	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
1904	女子国文教科书（初小）	十册	蒋维乔、庄俞、沈颐、戴克敦
1908	女子国文教科书（高小）	八册	蒋维乔、庄俞、沈颐、戴克敦

资料来源：整理自田野记录

民国成立后，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相继创办，⁴ 商务印书馆垄断教科书市场的局面才稍有改观，但商务仍占据教科书市场十分之六的情况，直至1949年止，基本没有改变（史春风2006：152-153）。商务印书馆依靠其人才济济的教科书编辑阵容、雄厚的资金、领先的印刷技术，⁵ 先后出版许多高质量的教科书。除了商务印书馆自编教科书外，中国民间还有不少民营出版机构投身编著和出版教科书事业，如上海民智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儿童书局、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大东书局、上海开明书局等。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教科书原为中国当地的学生而编写，并没有考虑到华侨居住地的气候、物产、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因素。1917年黄炎培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后，⁷ 就指出了“现行教科书之不适用于南洋”的问题，倡议各地华侨教育团体组织教材调查部，由各校教员合力调查当地社会情况，作为编写教科书的参考。此后，中国即开始着手编写专门的华侨学校教材。

1927年9月中国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后，编写南洋的书籍与教材就是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1929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侨校教科书的编纂工作逐渐加强。首先是对两次华侨教育会议上提出的“规定编辑侨校教科书原则”，“由教育部设立编审华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征集

华侨学校适用教材，整理后发交侨校应用；其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华侨学校教科书的法令；⁸ 第三，建立专门机构，组织侨教专家重新编印侨校教材”（别必亮 2001：103-104）。30 年代开始，国民政府对侨教特别重视，特地为南洋华侨学生编纂和出版教科书。自此，马来亚学校由采用中国国内学校通用的教科书，转为采用中国编辑出版，适合南洋华侨中小学使用，并富有南洋色彩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封面都标示“南洋华侨小学适用”、“南洋华侨小学教科书”等字样，以标榜教科书注入“南洋色彩”及适合南洋华侨学校采用。

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篇（1934），1930 年代初期英属马来亚侨校自编教材占 2%，购用教科书占 98%（引自别必亮 2001：100）。教科书由中国购入，以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出版者居多。3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特为南洋华侨学生编纂和出版教科书的情况有所改变，开始出现由中国编纂，在本地（新加坡）出版有关教科书。参与的出版社，如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世界书局、新加坡商务印书馆、新加坡上海书局、新加坡南洋书局等。前四家总行设在上海，在新加坡设立分行，而南洋书局则设立在新加坡。另外，还有由中国编纂，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

新式学校的教科书，无论从 20 世纪初由中国包办编纂出版，至 30 年代中国编纂注入南洋色彩，以至 30 年代中期在本地出版，皆以灌输中国意识为宗旨。是故，1952 年，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接纳《方吴报告书》（*Fenn-Wu Report*）的建议，开始着手重编华校教科书，设立“改编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及“改编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负责其事（郑良树 2001：169-170；宋哲湘，2009：45-46）。自此，马来亚华校教科书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完全由本地包办编纂和出版工作，真正实现“马来亚化”教科书的理念。

三、晚清时期教科书思想内容（1904-1911）

19 世纪中叶，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西方

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优势而来，使几千年来采取闭门政策的中国产生了压顶之势的冲击，并把空前的民族危机带给了中国人。尤其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所遭遇之惨败以及接踵而至的1900年庚子事变，更进一步把民族危机推向顶点。在亡国之忧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应运而生，并化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形成集体意识和认同，追求建立国富民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与列强平起平坐、主权完整的国家。

马来西亚新式学校的教科书，由于从中国输入，皆以中国为本位。这些教科书所辑选文，无不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中国）心，激励学生奋发之心，使成为效忠祖国的中国人，充满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强大民族主义的动力反映在晚清华文教科书上，教材呈现出浓烈的抵御外侮、自主、自救、自强的思想内容。

在帝国主义列强逐步蚕食中国的威胁下，近代中国人产生抵御外侮的强烈意识。这种抵御外侮的意识表述在晚清华文教科书中，表现为强烈的保家卫国、反帝国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意识，因此晚清教科书带有浓厚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鉴于民族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威胁，灌输国民爱国思想，成了晚清教科书的一大编辑要旨。《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二册第一课〈爱国一〉指出，国民应爱国如爱自己：

国家者，家族之大聚会也，故志士之爱国，如爱其家。国家之耻，一身之耻也。国家之敝，一身之敝也。一日在世，则必一日专注于国家。无他，推爱身爱家之心，以爱其国而已。⁹

（1906：2）

第二课〈爱国二〉则讲述战时之爱国乃“为国捍患”；平时之爱国主要表现在“兴起各种公益之实业”“使国家利权，不为外人所攘夺”。原文如下：

国有兵祸，奋其勇壮猛烈之气，以为国捍患。轻生命如鸿毛，是战时之爱国也。求学问，勤职业，律己则不苟。遇人则诚款，同心协力，以兴起各种公益之实业，使国家利权，不为外人所攘夺，

是平时之爱国也。二者若缺其一，则国中山河虽美，不足恃矣，物产虽多，不足夸矣。

(1906: 2)

课文进一步说明国民之爱国心，是决定国家之强弱之因素：

观国之强弱，视其民之爱国与否可矣。何也？国民相聚而成国家，以国民之爱国心，为其国家之元气。爱国心苟有缺乏，则名虽为国家，而无元气之贯注，其散亡可立而待矣，爱国心之关系，不重且大哉？

(1906: 3)

第三课〈合力〉强调聚合中国四万万国民之力，可使中国雄视五洲：

我国民人号称四万万，为环球各国所不能及。使能上下合力，可以雄视五洲，莫之能禦。顾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国势岌岌若不终日，则以能有四万万人，而不能合四万万人之力故也。呜呼！可不惧哉？呜呼！可不免哉？

(1906: 3)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1912）¹⁰ 初等小学第十册第九课〈外交失败〉指出，中国“不审外情，不图自强”，结果“外交失败，遂屡见不已”。文中揭示清政府将香港割属给英国的前因后果：

自葡人英人，以鸦片贩售我国，嗜者日众。林则徐恶其害民也，建议禁之。乃收外商所存鸦片二万余箱，禁焚之，禁不得更贩。英人不服，以兵舰侵江浙，乘胜逼直隶。京师大震，罢林则徐，与英议和，割香港，赔兵费。实为丧师失地之始，时道光二十二年也。

(1912: 8-9)

第十课〈外交失败〉续篇一，讲述几件清政府割地赔款的历史事件；第十一课〈外交失败〉续篇二，讲的还是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一一将土

地割据求和的事件，反帝国主义色彩极其鲜明。

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通过传播媒体网络、留学生和旅游见闻，引介了西方种族竞争的世界观、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国家观念，也因应当时的国家危机，民族主义成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¹¹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当下的危机，认为中国人不要“亡国灭种”，只有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和扩张。职是之故，晚清华文教科书许多篇章灌输学生现代民族国家观，使学生了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条件，如疆土、主权、国语、现代国家的立宪法与政制，以及培养学生具备现代国民的思想。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十册第一课〈社会〉说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以一定之人民，居一定之土地，而戴一定之主权者，则谓之国家”。第九册第一课〈国旗〉说明国旗乃一国主权之所寄，一国荣辱之象征：

国旗者，主权之所寄，所以代表其国。故凡新得一地，必树国旗于其上。其在外国之兵舰及公使馆、领事馆，皆本国主权之所在，故无有不悬国旗者。国旗而荣，即国家之荣也；国旗而辱，即国家之辱。是以一国之人，当尊敬本国之国旗，亦不得施无礼于他国之国旗。

(1912: 1)

《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八册第五十六课〈国语〉强调国语作为统一国民的语言，其培养国民爱国心的重要性。文中说明了国民不通国语的种种弊端，强调不通国语为“合群爱国之阻力”，其利害关系殃及国家：

不通国语，非独一人一家受其弊也。同为一国之民，同居一国之土地，其利害关系，至为密切。今以语言各异之故，凡属传达消息，交换智识，以及营共同之事业，皆有阻碍。我国四万万人，人各异心，恒为外人所讪笑。虽其原因甚多，而语言不一，实为合群爱国之阻力。此则无可疑者也。

(1906: 73-74)

20世纪初，清政府外迫于西力冲击，内迫于民众强烈要求革新政治、改造中国的情势，宣布推行“变法新政”、“宪政改革”。顺应当下的时代背景，《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一册第一课〈预备立宪〉收录了光绪皇帝颁布的谕旨。谕旨提到清政府通过立宪制“廓清积弊”、“重振中国”的大志：

……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乡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1906: 2)

第二课〈君主立宪〉讲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的利弊。第三课续篇进一步说明君主立宪的政制，以及实行君主立宪的好处。第四课则叙述清政府实行预备君主立宪的缘由：

近者，皇太后，皇上鉴于外患，知非立宪不足救国，乃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历使诸邦，博采列国之善政。既返命，遂计立宪，徒以官制未定，民智未开，乃先下明昭，为立宪之预备。

(1906: 5)

类似题材的篇章亦出现在其他教科书，例如《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八册第五十九课〈立宪与专制之区别〉；《国语教科书》（1907）初等小学第四册第八课〈宣布立宪〉、第十一课〈各国政体〉等等。灌输学生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教材，如《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八册第六十课〈大国民〉，讲述国民决定国家强弱：

东哲之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哲之言曰：人民者，政事之实体也。政事者，人民之虚影也。民德腐败，虽借一时之善政，以致富强，而终亦必乱。民风良善，虽因一时之乱政，以致失败，而久必复兴。由斯言之，国之强弱治乱，惟吾民实任其责。吾民而为大国民，则吾国无不昌矣。

(1906: 78-79)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近代中国人由御侮而求自强，向西方学习，承认过去不值一顾的“夷人”之长处，开始推进现代化的进程。鸦片战争时期著名领袖林则徐首先放眼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1860-1861年间，冯桂芬（1809-1874）率先在其名著《校邠庐抗议》（1898）提出超前的远见卓识。¹²他认为，中国应当采取西方优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几何学，而且应该采取措施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工业制造、开发荒地、开矿和改进农业工具（1999：69-72）。1896年，梁启超（1873-1929）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透露：“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1984：16）。

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就总体而言，集中地表现在努力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的新路。晚清华文教科书中许多篇章介绍中国民族自救的宏图，如军备现代化、振兴农工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强国方案。

《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五册第二十课《军备》，就说明了国家设军备的意义在于和平之保障：

国家之设军备，其意果何在乎。一曰战争而已，然以实言之，军备非为战争而为和平也。夫既为和平，则军备似可以已。不知无军备，则和平终不可得而保。

(1906: 25)

课文进一步阐述国家设军备不振将引发的问题：“为外人所侮”、

“以非理相迫”、“交战必难制胜”、“割地赔款”，以说明“早筹守御，以保和平”的必要性。课文如下：

国家当无事之时，糜无数之金钱。废多人之职业，日夜兢兢，修军备以保和平。毋乃多事，不知军备不振，则为外人所侮，或以非理相迫。反至于不得已而交战，战端既开，其资财之耗费，国民之失业，较之平时军备，殆十百倍而未已。且素无守备之国，交战必难制胜。而割地赔款之事，又将踵于其后，则何如早筹守御，以保和平之为得也。

(1906: 26)

面对列强的欺凌，要求军备现代化的呼声响起。《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1912）初等小学第三册第四十课〈兵器〉说明古代弓矢已落伍，采用先进兵器乃为强国之道：

强国之道，以兵为本。用兵之道，以器为先。今日制造精巧，战斗用枪炮，猛烈无比。陆有炮台，海有战舰。攻守之具，日益坚利。古之城郭弓矢，至今日皆无用矣。

(1912: 32)

教科书亦向学生介绍战争武器，使到学生对先进武器有所认识。《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五册第二十一课〈火药〉说明火药对枪炮的作用；第二十二课〈枪炮〉比较中国人、欧洲人所研制的枪炮的威力、大小、重量。类似表述欲通过军备现代化以强国的题材，尚有《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七册第二十三课〈军舰〉、第二十四课〈鱼雷水雷〉、第八册第二十四课〈陆军〉等。

至于讲述振兴农工商的教材，如《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三册第二十三课〈农业〉。此教材记述了中国丝业、茶业的地位受到外国竞争者威胁的窘境：

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皆产茶，贩运外国，为数甚钜。自日本、锡兰，先后仿种，我国业茶者，又不研求焙制之法，出口之茶，

遂以日减。

蚕事之盛，首推浙江、江苏，广东次之。生丝一项，在我国出口货中，亦占多数。今法、意、日本等国，讲求蚕学。产丝日良，我国反不如矣。

(1906: 27)

有鉴于中国出产的丝不如他国，课文末端发出振兴农学的呼声：“我国自古以农立国，然徒赖天时，为竭人力，故不能与各国争胜。然则欲尽地力，开富源，莫如振兴农学也”。《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四册第二十二课〈通商〉一文指出，一国的出口货和进口货的比例决定一国之贫富。由此，课文揭露中国工业不兴的弱点，故国家务必振兴工商业：

今本我国进出之货价而核之，每年出口货之价值，仅得进口货之半。且出口之货，以丝茶豆棉毛皮为大宗。舍茶而外，皆生货也。进口之货，以布呢铁器为大宗，则皆熟货矣。以我国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而通商之效如此，则工业不兴，而商业亦因而衰飒也。且进口货中，鸦片颇占多数，耗材而又弱民，则为害尤大矣。

(1906: 25)

谋求国家富强是改变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惨状、救国救民的根本出路，而教育被视为谋求国家富强之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教育救国的呼声高亢激昂，故教科书有许多教材向学生灌输教育救国思想。《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七册第一课〈教育〉指出：“今东西各国，亦重教育。其大学专门学，足以培植人才无论矣。而尤注意于小学，以期教育之普及”，又说“今之觐国者，恒视国民识字之多少，而第其国之文野”，点明了教育对国民的重要性，以及国民的教育程度决定国家前途的道理。教材举出两个以教育强国的实例：

英吉利属地偏五洲，国旗所建，无日入之时。论者推其致此之由，由于教育完全，养成国民笃信忍耐之性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

统一日耳曼。威廉第一，不称其将士之武勇，器械之监利。独以不世伟业，归功于小学生徒。

(1906: 2)

为了进一步论证教育强国，课文又举出一个反面教材：“俄罗斯幅员之广，甲于全球。海陆军备，素称强盛。惟教育一事，不及欧洲之先进国，卒为日本所困”。课文末段再次强调教育强国之愿望，希望国民自奋求学。课文写道：

教育之重要，稽之往古则如此，鉴于东西又如彼。回顾今日我国，四万万人中，入学校，受教育，有普通之知识者，万无一焉。即读书识字，能作书札，记账目者，亦百无一焉。以此不教之民，出与开明强健者角，又安往而不败乎？乌呼，吾国民其亦知自奋矣。

(1906: 2)

《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二册第六十课〈福泽谕吉〉一文，就提及日本大儒福泽谕吉三度到各国考察后，深切明了“教育乃立国之本”的道理。《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1912）¹³ 高等小学第三册第二十课〈国境〉一文中提到，决定国家强弱不在于国土的大小，而在于国民的素质，奉劝国民接受教育，以提高国民程度：

论国家者，不能以地之大小为等差也。巴西国境，倍于我邦；土耳其亦几与我埒，然皆不能自振。瑞士、比利时，幅员偏小，等于我之一二府耳。而政法修明，学术发达，俨然为欧洲望国。故覩国者，亦视其国民之程度而已。

(1912: 18)

在科学救国思潮盛行之时，人们把科技发展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最新国文教科书》（1906）高等小学第六册第五十二课〈科学之应用〉开篇就明确指出，欧美国家文明程度之高，归功于科学的进步，强调国家文明与科学知识息息相关：

欧美各邦，文明程度之高。若有令人不可思议者，要而论之，广用机器而已，科学进步而已。……然则欧美之文明，自商工业以至军事，无一不得机械之力者。而机械之制造及应用，一系乎科学之知识。是故言文明程度之差，由于科学之进步与否而已矣。

(1906: 67-68)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使国家取得科学上的进步，朝向现代化，晚清教科书在编写教材上，纳入许多自然课科学类文章，生物、物理、数学、地理、天文、化学、心理等科学知识。除了上述教材，教科书也收录许多灌输国民自强之道的教材，例如培养学生建立强身健体、自立、尚武，以及破除封建迷信的思想，以达到民强救国的目的。尤其是破除封建迷信、鬼神邪说的教材为数甚多。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1912）初等小学第四册第三十六课〈缠足之害〉详细说明缠足使人终身病废；第三十七课〈缠足之害〉续篇进一步讲述缠足的害处。《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四册第五十八课〈西门豹〉讲述西门豹识破三廷掾与巫祝以替河伯神娶妇为由，牺牲女子性命和敛民财的妖言邪说，借以破除百姓迷信的观念；《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三册第十三课〈偶像〉借揭破“购像者当得巨富”之说，反对偶像崇拜；第二十九课〈邺原〉驳斥树有神灵之说；第四册第五十六课〈鬼神〉讥讽村妇焚香求神而不务正事；第五册第二十课〈祀蛇〉训斥愚民奉蛇为宅神，对蛇稽首屈膝的可笑行为；第二十一课〈张天师〉揭露张天师造妖言惑众以敛财；第四十五课〈五路财神〉讽刺世人设祠祀五路神和财神，“不知人能勤俭，家业自兴。若不求其实，日以祷祀为事，何益之有”；第六册第五十课〈村人〉讥讽村人愚昧信鬼神，要求“却死之方”；第八册第五十五课〈义和团〉续篇则通过义和团自言归依神灵，枪炮不能伤，但在八国联军攻天津时，却死于枪炮下，否定了神灵护体之说。类似破除民间封建迷信思想的教材，不一而足。

1904年5月15日，马来亚第一所新式学校——檳城中华学校正式开课。梁碧如（1857-1912）副领事受邀在开课典礼致词时，特别强调“檳城中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以救国，言其小可以致富；言乎私可以利己，言

乎公可以达人”，劝导学生“奋勉向学，冀成大器以报国家、以进文明、以光前烈、以楷后进”（陈剑虹 2004：16）。1905年7月，张振勋奉命管理槟城中华学校事务，并将光绪皇帝赏给的御书“声教南暨”匾额及《图书集成》移交到槟城。他在会上郑重致词，宣布教育宗旨：

国家已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所以我皇太后皇上属谕飭各省设立学堂，此诚务本之第一要举。自奉谕旨之后，各省官设私设学堂，不可胜计，其在上等社会者固不必论，即如贫民社会之人，亦皆踊跃奋兴。

（引自陈育崧 1974：57）

从上述梁碧如和张振勋的两段演说内容，我们可推断在马来亚新式教育办学宗旨始终脱离不了时代的使命，为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量才录用”。为此，华侨对全民企盼国家脱离贫弱的困境作出呼应，这可从华侨在马来亚各地兴办学校和上述梁碧如和张振勋的两段演说内容可见一斑。综合晚清时期教科书的思想内容，我们可说教科书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与当时兴办新式教育的宗旨是紧密相连的。教科书通过各篇章宣传爱国思想、现代国家与国民思想、反封建迷信等思想，积极地灌输学生“救国”、“强国”、“富国”的观念。

四、民国时期教科书思想内容（1912-1949）

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方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宋原放 2004：513）。民国时期的华文教科书中，1910年代和1920年代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一部分沿袭晚清教科书，特别是关于军事教育和培养新国民素质的教材，如保家卫国、教导国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自然科学知识，灌输学生有关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反迷信、反封建思想等。

民国时代教科书一如晚清时期教科书的思想内容，体现强烈的反帝国

主义思想。自 1925 年以后，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谓中国所编课本里面，常带有政治意味的教材，乃时加检查干涉（许苏吾 1950：64）。事实上，1925 年，许多排外的材料，都编入教科书内，尤其拟煽动反英的情绪。¹⁴ 英殖民地政府认为对马来亚华校儿童灌输种族仇恨思想，不能为英殖民政府所容忍，于是禁止含有煽动性材料或者有煽动各族仇恨的材料的教科书，同时这类书的输入亦受禁（巴素 1950：162）。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权和避免受到危害其权益的思想所影响，规定华校课本不能有反英、反帝、反殖民及煽动种族情绪的内容，对华校采用的教科书严加审核和管制（周聿峨 1995：128；郑良树 1999：206，222）。

1929 年，三民主义被定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新教科书便充满宣扬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等思想的教材。在 30 年代，教科书有许多传播革命思想，灌输三民主义思想和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教材，例如反抗强权、褒扬革命人物、¹⁵ 宣扬革命思想、称颂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和其英勇事迹等篇章。

为使学生对国家奇耻大辱有认知，并从国耻中得到警惕，激发学生反帝国主义意识，不少有关中国丧权辱国事件的教材编入教科书中。《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29）初小第五册第十七至十九课〈国耻〉与〈雪耻歌〉。¹⁶ 《新主义国语读本》（1930）高小第一册第十课〈国耻纪念歌〉叙述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国耻，如同一部列强侵华概要史，对失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如数家珍地一一胪列。教科书通过“国耻唱本”使之流行于社会，明确将文艺作为宣传工具，注入现实主义的思想，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教材虽以活泼的歌谣形式书写，但是却掩盖不了国耻的悲痛，欲一雪国耻的心志。原文如下：

中华民国耻辱多，听我唱个纪念歌：二月二十四，伊犁约定于是。记得三月一，英国将我缅甸灭。说到三月六，胶州又被德国租。三月二十七，旅大变成租借地。四月一十七，台湾被割韩独立。最近五月三，暴日抢占我济南。丧心五月七，日提条件二十一。五月一十六，瓊瑋约成疆土蹙。最恨五卅，上海英捕大惨案。双耻六月九，安南占去九龙丢。六月二十九，天津约成民族辱。七

一失海港，威海卫租门户开。八月一十四，联军攻破我京师。八月二十九，鸦片战争已忘否？九七记辛丑，炮台毁我大沽口。九月一十三，强迫赔银二十万。十月二十四，英法联军大放肆。十一月十四，海参威割俄染指。十一月十六，广州湾租法肆酷。重大国耻最甚，较小事件不具论。鸦片战争种祸根，五卅屠杀最痛恨。是可忍兮孰可忍，雪耻责非异人任。

(2009: 243)¹⁷

由上引文可见，教科书编入的国耻事件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清政府时代。《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29）高小第一册第二十六课〈清末外交痛史之一节〉痛陈清朝腐朽的政府；《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912）第七册第四十八课〈租借割让地〉说的是国家形势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对于清政府外交失败导致租借割让地，表示万分感慨。文中写道：

清政不纲，外交失败，割地赔款，不可胜数。沿海沿江之地，租借割让殆尽矣。沿海之地，旅顺大连，初租与俄。日俄战后，转租与日。威海租与英，胶州湾租与德，台湾让与日，香港割与英，广州湾租与法，皆沿海要隘也。

满洲东北数千里之地，伊犁西北千余里之地，皆割与俄。云南西南二千里之地，又让与英法。最近俄争满洲里，英据片马，疆场日蹙，良可慨也。

(1912: 28-29)

在三民主义被规定为教育宗旨后，教科书出现大量革命人物的介绍，借以引起学生的爱国观念与革命思想，其中以介绍孙中山的课文篇数为最。在介绍孙中山的篇章中，以称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建设国家的功劳最多。《小学国语读本》（1935）高小第四册第十四课〈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演说辞〉讲述孙中山为了救国事业，终年奔走，患上肝病也无暇医治，最后在北平旧病发作，一发不可救药。孙中山弥留之际，还不断地发出微弱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至死不忘人民，不忘国家。《复兴国语教科书》（1946）初级第六册第十一课〈孙中山先生的逝

世)¹⁸ 和《国语》(1948)初级第六册第三课〈孙中山先生〉与上文内容大致相同。

灌输三民主义的教科书也通过一些孙中山小时候的生活故事,展现孙中山从小就抱有革命思想和政治理想。《国语》(1948)初级第四册第五课〈一定要改革〉讲述孙中山小时候看见清兵随便捉人,夺取人民的财产。这一件事使孙中山有感而发,认为国家一定要改革,人民才能有幸福。《复兴国语教科书》(1948)初级第四册第十九课〈中山先生不怕海盗〉讲述孙中山看见海盗进村子抢劫,独自走去看强盗,暗暗地叹气道:“国家养兵有什么用,人民财产不能保!这个国,不改造,哪会好!”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腐败的政府促使孙中山的心中燃起了推翻清廷,改造国家的愿望。《复兴国语教科书》(1949)初级第四册第二十课〈哪个愿意做强盗〉¹⁹ 记述强盗入村抢劫,孙中山感叹国民为强盗:“强盗力气大,又勇敢,做工开矿,不是更好吗?国家富了,人人有工做,哪个愿意去做强盗呢?”教科书介绍的革命人物除了孙中山,还包括黄克强、蔡锷、璜卿、陈英士等革命烈士。诸如此类篇章注重国民革命教育,通过孙中山和其他革命烈士的革命思想,从小对学生进行国民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是由于华文教科书充满反帝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当时许多教科书被马来亚殖民政府列为禁用书。

其实早在192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已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郑良树1999:206)。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总督任职期间(1930-1934),对华校教科书审查与禁用,更是雷厉风行。在1930至1935年,殖民地政府几乎每年都公布一批禁用教科书(见附录二)。以1935年为例,殖民政府在公报公布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为禁书。²⁰ 禁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一、清末以来中英外交的详情;二、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的远近原委;三、觉醒中国民众与复兴民族的思想;四、现代帝国主义者所处的阶段及其对付中国的政策;五、启示中国青年认识本国(中国)今日所处的危殆地位(周聿峨1995:130;郑良树1999:222)。殖民地政府当局虽禁止华校采用从中国进口且含政治色彩的教科

书，但却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修订华校课程内容和改编教科书内容。实际上，早在30年代期间，殖民地政府即有意重新编纂华校教科书，但囿于人力、物力，迟迟未实现（崔贵强 1994：275）。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1931年溆阳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件。接二连三的日本侵华事件，使到抗日救亡成为30年代的社会思潮，这也自然成为编写教科书的主导思想。30年代开始出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积极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尤其是抗日思想教育。它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民抗日救亡图存的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思想教育，教科书编者希望学生认清当前形势，团结抗战，挽救中华。

教科书中反映抗日思想的教材，包括揭露与控诉日军暴行、赞扬中国与南洋的抗日英雄、歌颂抗战胜利等篇章。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教科书中也作出叙述，以激发学生的抗日精神。《国语》（1948）初级第六册第九课〈中华民国万岁〉讲述1932年3月12日，发生在溆阳的一件抗日故事。故事反映抗日救国，并揭露日军的暴行，情节悲壮。原文如下：

“九一八”以后，日军占据我国的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强迫溆阳各学校开会庆祝。

溆阳第二小学的学生都齐集校内大礼堂，一声不响，也有暗暗落泪的。几个日本人演说以后，就有日本宪兵传令呼喊“满洲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小学生们一个也不作声。日本逼着大家喊，小学生就狂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兵拔出刺刀喝道：“谁敢再喊……”话没说完，忽听得一声尖锐的口号：“打倒小日本！”大家抬头观望，原来是中年级的一个学生高麟府喊的。这位热心爱国、不怕强暴的小英雄，当场便给日兵刺死。他临死时，还高呼着：“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1948：12)

40年代，灌输三民主义思想的教材仍然占重要位置。1941年发生太

平洋战争，日本帝国疯狂地展开侵略行动，抗日运动再度活跃起来，是故灌输抗日救国和爱国思想的教材也占一定篇幅。《小学国语读本》（1951）²¹ 初级第七册第十二课〈海盗（二）〉讲述 1937 年卢沟桥事件，抗战发动扩大到全国，以及 1941 年偷袭檀香山、²² 马来亚等南洋地方，到处劫掠残杀，残酷无比。课文末段作出提问：“海盗呀！祖国同胞，海外侨胞，西方英、美人，东方印度、马来人，一样的受到你们捣乱和残杀，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对日本海盗的酷刑，作出愤怒的控诉。

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华校大部分都自动关闭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复课的学校寥寥无几。日治时期，日本帝国将麦考利式的日本化当作国家政策来加以推行。²³ 所有学校名称都改为日文的片假名，教育媒介语改为日文。日本宪兵下令书局交出所有中文书以便审查，除了字典与地理课本外，其余书本都被烧毁，估计约有 20 万本书被烧掉（引自柯嘉逊 2002：31）。华校在重开后受到严密的管制：旧有的教科书被禁止使用，新编教科书以及教学内容和进度都必须获得教育部的批准（蔡史君 1984：82）。

除了上述在各年代比较突出鲜明的主题，灌输学生热爱祖国（中国），呼吁学生使用国货的篇章，也是教科书主要的思想内容。与此同时，灌输学生发扬与传承中华文化的篇章，也是教科书收录的主题。总括而言，御侮强民、三民主义、抗日思想、爱国主义以及传承中华文化，乃是贯穿民国时期教科书主线的思想内容。

五、独立前夕教科书思想内容（1950-1957）

马来亚华校采用中国编撰的教科书的情形一直维持到 1953 年，至马来亚编纂与出版的首套教科书——联营出版《国语》为止。中国编写的教科书有许多教材与本地实际相脱节的现实，已是不争的事实。有识的教育界人士早已有改编教科书的想法。1951 年正月初，方卫廉（William Purviance Fenn）和吴德耀（Wu Teh Yao）受邀到马来亚调查华校情况，《方吴报告书》出炉后，殖民政府才积极地进行改编华校教科书事宜。

方卫廉和吴德耀受邀到马来亚调查华校情况，其中包括“提供关于编撰可资目前应用的，以马来亚背景及内容代替中国背景及内容的教科书的意见”（方卫廉、吴德耀 1955：3）。1951 年底，马来亚大学教育系美生教授（Frederic Mason）在新加坡某英文女校发表演说，指摘华校是本邦离心力最重者，认为教科书必须改编，并主张先由英文写成，然后译为华文。殖民地政府也一再强调要培养本地意识，使华人认同于马来亚，把自己视为马来亚的公民，这可说是政府改编华校教科书的主要原因（林连玉 2001：32）。

如前所述，1952 年，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开始着手进行重编华校教科书事宜，并设立“改编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及“改编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负责其事。改编华校教科书之目的，乃拟将各华校采用之课本内有关民族思想的部分删除，而增加有关马来亚的教材（宋哲湘 2009：87）。1950 年代，马来亚朝着自治建国的道路迈进。为了培养华人子弟以马来亚为效忠国的思想，教科书的编纂注重灌输本土意识，编纂展现“马来亚”色彩的教科书。

新马华社对改编华校教科书的反应，一般赞成修改华校教科书，²⁴ 但是华社却担心教科书一旦“马来亚化”后，将消灭中华文化，“牺牲我们认定的发扬华文教育的独特精神之目的……必将摧毁华文教育”。²⁵ 界都对改编华校教科书之事非常关注，纷纷提出批评马来亚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²⁶ 华校联合会也就此事发表书面谈话：“编纂华校教科书事，勿由政府一手编纂，亦不应采取狭义马来亚化观点”（《南洋商报》1952.4.27）。中华总商会深受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政治主张和理想比马华公会更鲜明，比马华公会更激进，较直接地追求华人在马来亚的平等政治权利，更主张保存华族文化（庄国土 2003：110）。中华总商会对改编教科书一事极为重视，公开表示“对改编教科书事决为校联会后盾”（《南洋商报》1952.4.30）。

为消除华社心中的疑虑，星洲教育司菲力士比发表谈话表示：“改编华校教科书，非消灭中国文化，改编目的在统一各族学校教材，内容采纳各民族文化风俗特性等”（《星洲日报》1952.4.20）。联合邦华文副提学司

路易士 (L. I. Lewis) 则强调“改编华校教科书, 非排斥华人文化”, 并针对“马来亚化”一词予以解释。他说: “由于各校学生乃住在马来亚之故, 所谓教科书马来亚化一点, 系指仅采用‘具有马来亚背景’的教科书云”。最后, 路易士予以保证称: “凡是本邦华人公论不加以接受的新教科书, 当局将不强迫华校采用之” (《星洲日报》1952.4.19)。为了编撰可以为华社接受的教科书, 1952年5月7日, 当局通过报界表示, 关于华校教科书改编内容, 各华校如有建议, 可向咨询会提出, 以供咨询会及编委会研究与参考 (《星洲日报》1952.5.7)。同日, 当局在《星洲日报》发表国语、²⁷ 常识、地理、公民四科课程纲目, 希望教育界提供宝贵意见。1952年6月26日, 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公布国语、公民及自然各课本编纂原则, 并表示欢迎公众人士以书面提出批评, 交予该会 (《星洲日报》1952.6.26)。1952年5月22日, 华校改编课程咨询委员会在会议中通过, 凡华校改编课程标, 须待咨询会审查, 然后交中央委员会通过, 才在各报上发表, 同时征求各界人士意见, 最后再交由中央委员会作第二次通过 (《星洲日报》1952.5.23)。此举无疑为安抚华社惶恐不安的心情。改编华校教科书就这样在华社纷纷扰扰的情形下进行。

当时, 华教中坚分子林连玉和沈慕羽身负重任, 既是中央委员又是咨询委员。林连玉认为华校教科书许多教材脱离本地的现实, 因而主张除了必须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外, 马来亚的教科书内容也应本地化, 现在正好仗政府的力量予以实现 (林连玉 2001: 32-33)。于是, 他领导教总参与重编华校所用教科书, 一改变教科书由中国编纂、中国出版的惯例。经过审查, 准予出版教科书的有三家出版社: 一是联营出版社, 二是南洋书局, 三是上海书局 (同前: 32)。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监管下出版的第一套华文教科书于1953年诞生, 由联营出版社所出版。此套教科书强调“教材尽可能配合马来亚实际的自然现象与生活状况”, 教材内容以马来亚和邻近区域为主, 所灌输的爱国主义是以居留国为对象而不是中国, 以培养学生成为忠诚之马来亚人民。

《国语》(1954) 三上第三课〈马来亚少年歌〉灌输学生不分种族, 携手为马来亚奋斗的观念。教材所体现爱马来亚的思想, 在50年代前是

不曾有过的。原文如下：

我们是新时代的儿女，
我们是马来亚的少年！
我们有勇敢的精神，
我们有博爱的心田。
我们不分种族，联合一起；
要为马来亚的快乐自由，一齐向前！
要为马来亚的快乐自由，一齐向前！
(1954：4)

《国语》（1953）四上第四课〈为马来亚歌唱〉歌颂马来亚有繁盛的城市和幽美的乡村，还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并强调华人在马来亚生长，永远把它当故乡。教材表达对马来亚的热爱，自不在话下。原文如下：

可爱的马来亚啊！
我们来为你歌唱；
你有繁盛的城市，
你有幽美的村乡！

可爱的马来亚啊！
我们来为你歌唱；
你有广大的胶园，
你有无穷的矿藏！

我们七百万儿女，
大多在这里生长；
还有那子子孙孙，
永远把你当故乡。
(1953：6-7)

又如《高级国语》（1956）五下第二十三课〈我们爱马来亚〉向学生

灌输一个崇高的理想——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献身于马来亚。教材是抒情诗，抒发对马来亚热烈的感情。原文摘录如下：

我们的家，
在马来亚，
我们爱家，
我们爱马来亚。

我们的祖先到马来亚，
辛勤地开垦了马来亚。
血汗滋养着马来亚的泥土，
血汗造成了我们的家。

我们生长、壮大在马来亚。
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
我们像祖先一样流着汗，
要献身给马来亚！

我们的家，
在马来亚，
我们爱家，
我们爱马来亚。

(1956: 163-164)²⁸

类似题材，尚有《初级国语》（1956）二上第二十二课〈马来亚是好地方〉；《国语》（1954）四下第八课〈可爱的南洋〉。

为了加速学生向本土认同，建立所谓的马来亚意识，教科书中收录许多体现本土意识的教材。这类教材揭开马来亚的面纱，让学生深入地认识与了解马来亚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以及社会面貌等。至此阶段，教科书终于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而灌输学生“热爱马来亚”，使学生产生“本土意识”，成为教科书的主要思想内容。以联营出版的《国语》教科书为例，具马来亚意识的课文占全书的比率，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国语》马来亚意识教材占全书比率

册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课文总数量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马来亚意识教材数量	0	0	2	1	10	19	28	9
百分比	0	0	0.6	0.3	27.8	52.8	77.8	25.0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营《国语》教科书

在文化上来说，马来亚华人知道自己和中国的同胞享有共同的历史渊源、语言、价值观、起居习惯等文化习俗。马来亚华人选择了永久定居马来亚。在新的国家，华人不得不留心如何维护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地位，想办法在新国家的法律范围之内，维护他们民族的权益（王赓武2002：315）。在华人文化身分自我定位和追求之际，维护与传承中国文化成为当下华人的共识。在教科书中，传承中国文化的思想表述在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古代经典作品、中华民族伟大发明与创造、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等篇章上。有关宣扬儒家道德价值的篇章如表三所示。

表三：教科书宣扬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之教材一览

出版社	教科书	课序	篇名	道德价值
新加坡联营	国语三上	二十五	勤学的孩子	勤勉
同上	同上	二十六	勇敢的孩子	爱国
同上	国语三下	二十二	孔子	仁爱
同上	同上	三十	孟母断机	勤勉
同上	国语四下	十二	岳飞	忠勇
新加坡上海书局	初级国语四下	十三	王冕	勤勉
		十四		
同上	高级国语五上	六	墨子的故事	和平
同上	高级国语六上	十五	屈原	爱国
同上	同上	三十五	木兰	爱国
		三十六		

同上 新加坡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	高级国语五下 国语第七册	一 二十一	友爱与互助 提倡节约的 一封信	仁爱 节约
同上 新加坡南洋书局	同上 国语高小第一册	三十 三十四	屈原的故事 坚韧的毅力	爱国 有恒

资料来源：整理自 1950-1957 年华文教科书

教科书也收录一些千锤百炼的古代经典之作，提供学生中国文化的养料。这些古诗或由经典名著改编而成教材，让学生在醇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接受优良的传统文化。教科书中收录有关中国古典名篇或诗文的教材如表四所示。

表四：教科书中国经典名篇之教材一览

出版社	教科书	课序	篇名	出处
新加坡联营	国语四上	三十四	愚公移山 ²⁹	《列子·汤问》
同上	国语四下	九	越王勾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新加坡上海书局	初级国语三上	三十四	自相矛盾	《韩非子·难一》
同上	初级国语三下	十一	“这是狗洞呀”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同上	同上	十二	楚王受了奚落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三	枳和橘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四课	中国民歌	民间文化艺术
同上	初级国语四上	二十七	卧薪尝胆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同上	同上	二十九	悯农诗	唐·李绅
同上	初级国语四下	十五	小时了了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同上	同上	十六	神童方仲永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同上	同上	二十	铁杵磨针 ³⁰	宋·祝穆《方輿胜览》

同上	同上	二十一 二十二	空城计	罗贯中《三国演义》
同上	同上	二十三 二十四	西门豹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
同上	高级国语五上	二十七 二十八	赤壁之战	罗贯中《三国演义》
同上	高级国语五下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完璧归赵	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同上	高级国语六上	五	韩非子寓言	《韩非子》
同上	同上	二十四 二十五	草船借箭	罗贯中《三国演义》
同上	高级国语六下	二十七	石壕吏	杜甫《杜工部集》
同上	同上	二十八 二十九	武松打虎	施耐庵《水浒传》
新加坡南洋书局	国语高小第四册	九 十 十一	孙悟空与死亡战斗	吴承恩《西游记》
同上	同上	十三	唐诗四首 ³¹	唐诗
同上	国语初小第七册	三十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同上	同上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孔明借箭	罗贯中《三国演义》

资料来源：整理自 1950-1957 年华文教科书

此外，教科书收录一些关于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教材。为让学生从历史中重拾民族昔日的优越感和荣耀心，激发学生传承文化的民族意识，教科书中收录了介绍中国人的工艺技术与科学发明的教材。《高级国语》（1956）六下第二十四课〈瓷器〉通过介绍中国瓷器的发明，让学生认识瓷器是中国古代人民伟大的科学创造，也是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第二十

五课〈丝国〉讲述西洋人叫中国是“丝国”的由来及蚕丝发明的经过，使学生了解蚕丝的发明与利用是古代中国人高度智慧的体现。《国语》（1957）高小第四册第二十四课〈中国茶叶〉追述中国人悠久的喝茶文化，使学生知道中国人是最先懂得使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一个先进民族，为中国人是喝茶文化的开山鼻祖而引以为荣。《高级国语》（1956）六上第十六课〈古代天文学家〉通过张衡发明浑天仪，讲述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这些教材使学生了解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和智慧，骄傲地继承了祖先光辉的遗产，并且加以发扬广大。

教科书也介绍中国其他传统文化，如介绍华人传统节日。《国语》（1954）三上第十八课〈清明节〉、《国语》（1954）三下第九课〈中秋节〉；《国语》（1956）第七册第二十九课〈端午节〉。

马来亚独立前夕，马来亚联合邦于1956年通过《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此报告书明文规定马来亚联合邦学校的课程必须本土化。马来亚联合邦华文小学教科书的内容配合此报告书，全面迈入本土化。综观上文教材内容，50年代初至独立前夕的教科书的主题，无不围绕在灌输学生爱马来亚情感、培养本土意识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的题材上。教科书中强调“爱马来亚”、“本土意识”、“传承中华文化”的思想内容，实际上，其背后又牵涉到马来亚华人以此因应英殖民政府打压华人与华教的力量资源。惟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不赘言。

六、结语

从上述马来亚华文教科书编制上的发展，我们可作出结论：马来亚采用的教科书在编纂和出版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4年至20年代末年，采用完全由中国编纂出版，同为中国国内学生使用的教科书；第二阶段：30年代至1952年，采用中国特为南洋侨校所编制出版的教科书，而于30年代中期开始由中国编纂，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第三阶段：1953年开始，教科书由本地编纂，本地出版商所出版，从内容编纂到出版皆走向本土化。这三个阶段的编辑出版概况，或多或少反映了马来亚华文

教科书编辑出版的概况。

从教科书思想内容来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04年至1952年的教科书，培养学生的中国意识，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30年代开始，虽然教科书开始注入南洋色彩，特别标榜教材适合南洋侨校使用，但仍以灌输中国意识为宗旨；40年代，教科书中认同马来亚的思想逐渐萌芽，这可从华侨在南洋奋勇抗日的教材一窥端倪。第二阶段：1953年，随着第一套完全由本地编辑出版的教科书之诞生，教科书的思想内容明显转向对马来亚认同，向学生灌输“爱马来亚”、“认同本土”的观念。在政治认同上转向马来亚之际，华人不忘发扬与传承中华文化。总括而言，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马来亚华文教科书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对国家认同、本土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注释

- 1 “马来亚” (Malaya)，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指的是英属马来半岛，分为三个行政区：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马来属邦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海峡殖民地由新加坡、马六甲及檳榔嶼组成；马来联邦由雪兰莪、霹靂、森美兰、彭亨组成；马来属邦则由柔佛、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组成。在1948至1963年，是指“马来亚联邦”，除了新加坡自成皇家殖民地 (Crown Colony)，上述其余地区皆包含在内，并于1957年从英国手中获得自治权，宣布独立。所谓新式教育，是指仿效西方学制、课程与教材内容，以寻求新的价值观——现代性，注入现代生活内容的教育方式。
- 2 “国文”即今日之“华文”。“国文”改称“华文”之前，称为“国语”。1920年1月，中国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用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颁订新式标点符号。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改“国文”为“国语”。
- 3 本表由笔者根据所收集到的晚清国文教科书，并参阅闫萍、张雯主编的《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整理而成。
- 4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创办；中华书局于1912年由陆费逵创立；世界书局创办人为沈知方，创立于1917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自1920年代，并列为中国三大书局。
- 5 根据《商务五十年——一个出版家的生长及其发展》的记述，商务印书馆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伍，想利用外人的技艺和经验，同时为阻止日帝的文化侵略，曾与1903年吸收日本出版业金港堂的资金，并招聘日籍技师协助印务，直至1914

- 年才将日股全部收回。在这个阶段中，商务在印刷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彩色石印、雕刻铜板、照相铜板和柯罗版印刷都是在这个阶段中开始采用的（1992：549，765）。
- 6 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所编辑出版的教科书繁多，而且许多教科书已散失，遗漏在所难免，故笔者不把民国时期采用的教科书编辑成表。马来亚独立前所采用的华文教科书亦作如是处理。
 - 7 黄炎培（1878-1965），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倡者。1917年，黄氏受教育部之托，偕林鼎华南下赴英、荷属地，考察华侨教育。回中国后，撰写〈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发表于《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十一、二号，对侨教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 8 有关华侨学校教科书的法令，如：规定“华侨小学教科书须用大学院所审定者”（大学院《华侨小学暂行条例》第八条）；“侨民中小学教科书应由该管领事或教育部，侨务委员会派往办理侨民教育之人员，会同当地侨民教育团体及侨民中小学教职员代表，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选委员会。就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选定若干种，任各校采用。为适合地方情形起见，并得由该委员会，加以修改，或另行编辑”（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修正侨民中小学规程》第15条）；“征集侨校教材，编订侨校适用教科书”（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实施纲要》）等等（别必亮2001：103）。
 - 9 原文直竖印刷，没有新式标点符号，分句之间只有小圈，标在原文各句右边。上文的标点符号为笔者根据个人理解所标上。接下来的晚清教科书中引文的标点符号出处亦如此处理。
 - 10 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的《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实为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订正版。民国初立，商务印书馆因对时局判断有误而延误了出版“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的共和国教科书。同年中华书局创立，其所编《中华新教科书》印成发行，取得“天时”之利，夺取商务全部的教科书营业。商务原有的教科书已失时效，故将《最新国文教科书》稍作修订，把灌输“忠君崇满”和不合民国宗旨的教材删除，以宣扬“共和精神”“民主政治”自由思想的教材取代，将之推出市场。笔者无法搜集到《最新国文教科书》，却找到《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1904）。笔者将《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与《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对照比较，发觉两套书的课文几乎相同，只有两三课内容有所更动。国文教科书往往体现了时代精神，为还历史原貌，根据历史事实立言，笔者把《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纳入晚清时期教科书阶段讨论。
 - 11 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翻译英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在19世纪末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中国，宣传“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以及揭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种族竞争世界观，来唤起民族的觉醒，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进步作用。梁启超在其最重要的中国启蒙思想代表作《新民说》论证了“新民”的重要性，提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梁

启超最先提出以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抗衡的观点。他说：“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民族主义一策。”。

- 12 此处的“抗议”实际意思是“直言不讳”，同于《后汉书》中的“抗议”之意（徐中约 2005：275）。
- 13 商务印书馆于 1912 年出版的《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实为商务印书馆于己酉年（1909 年）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再版。“订正”系列教科书出版的原由，见注 10。基于注 10 相同原因，笔者将《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纳入晚清时期教科书讨论之列。
- 14 根据巴素《马来亚华侨史》的记述，含反英色彩的教材，例如供给十二岁学生采用的教科书中的插图，曾绘有一幅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图画，身穿制服的英警，开枪击倒徒手的人群。在历史教科书内，亦大肆提及鸦片战争及英帝国主义政策的事（1950：162）。
- 15 在众多被称颂的革命人物中，以孙中山的篇章为最。教材从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精神、建设国家的贡献、革命期间重要事迹、高尚品格、幼年生活故事、嗜好、外貌、铜像、陵墓、诞生地、故居、当了临时总统后的生活故事等，题材与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 16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高等小学）出版于 1927 至 1932 年。1930 年，此书被马来亚殖民政府宣布为禁用教科书。此教科书资料乃参考闫萍、张雯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
- 17 《新主义国语读本》（高小）出版于 1930 年，同年被马来亚殖民政府宣布为禁用书。此教科书资料参考闫萍、张雯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引文所标的页数为此文在该书之页码。
- 18 同一教材亦收录于《复兴国语教科书》（1949）初级第五册第十课。
- 19 篇名〈哪个愿意做强盗〉之“哪”，原文用“那”。
- 20 有关 1930-1935 年英殖民政府公布的禁用教科书，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页 206-207，216-218，220-222；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页 128-130。
- 21 《小学国语读本》初级第七册虽出版于 1951 年，实为 1948 年版本的再版。是故，此书列在民国时期教科书讨论之列。
- 22 史料一般写“珍珠港”。檀香山即“火奴鲁鲁”（Honolulu）。珍珠港在夏威夷岛瓦湖岛南岸，东距火奴鲁鲁 9.6 公里。它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军港。
- 23 马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于 1844 年在印度提出《教育备忘录》。此《教育备忘录》引进一个彻底的英国式教育体系，创造出“一个种类的人，他们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他们的品位、意见、道德与思维能力却是英国式的”。
- 24 马华公会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陈修信表示：“马华公会赞成修改华校教科书，将教科书马来亚化，但不应消灭中华文化”。见《星洲日报》，1952 年 4 月 20 日；中华总商会会长陈锡九赞同教育马来亚化，他认为改编华校教科书，不能说是消

- 灭中国文化，华校联合会不宜放弃责任，应派代表参加教科书咨询会。
- 25 见《南洋商报》1952年4月18日社论〈重编华校教科书评议〉。1952年4月9日，中央教科书委员会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会议。联邦教育阁员拿督杜莱辛甘(Dato Thuraisingham)在致词中强调“马来亚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不但须基于马来亚之观点，且须包含共同之中心题材及内容”。作者认为此为露骨地说明拜恩教育报告书建议的“马来亚国民教育”，将乘此机会推进到华文教育的领域，此将威胁华文教育的处境及前途。因而著文呼吁华社予以严切的注意。
- 26 见《星洲日报》，1951年12月22日社论〈华校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星洲日报》，1952年5月3日，黄亦如〈修订与编撰华校教科书之我见〉；《星洲日报》，1952年5月10日，林东明〈关于改编华校教科书〉。
- 27 即今日之“华文”；此处维持旧称，以存史迹。
- 28 此页数为教材在《现代国语教学法》(1956)五下之页码。
- 29 此主题之教材亦收录于新加坡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1956)第七册第三十四、三十五课〈愚公移山〉(话剧剧本)；新加坡南洋书局《国语》(1957)高小第一册第三十五课〈愚公移山〉；新加坡上海书局《初级国语》(1957)四上第三十五、三十六课〈愚公移山〉。
- 30 此主题之教材亦收录于新加坡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1957)第六册第三课〈铁棒磨成针〉。
- 31 《唐诗四首》收录柳宗元〈江雪〉、王之涣〈登鹳雀楼〉、李白〈赠汪伦〉、贺知章〈还乡偶书〉。

参考书目

- 巴素著，刘前度译 1950。《马来亚华侨史》。檳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 别必亮 2001。《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蔡史君 1984。〈战时马来亚的华人〉。载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67-87。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
- 陈剑虹 2004。〈檳榔屿孔圣庙中华中小学创校史〉。载《檳榔屿孔圣庙中华中小学庆祝创校百周年纪念特刊(1904-2004)》，页 14-18。
- 陈育崧 1974。〈星马华文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载宋哲美编《星马教育研究集》，页 45-66。香港：东南亚研究所。
- 崔贵强 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管有限公司。
- 方卫廉、吴德耀著，吴绍葆译 1955。《马来亚华文教育问题调查团报告书：马来亚华校与华文教育》。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 冯桂芬 1999。《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页 69-7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亦如 1952。〈修订与编撰华校教科书之我见〉，《星洲日报》5月3日。
- 柯嘉逊 2002。《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 李志贤 2001。〈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及其统一课程之发展——兼叙其历史课本之编纂〉。载《人文杂志》2001年9月底11期，〈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与华人史〉专辑，页18-38。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
- 梁启超著，李华兴、吴嘉勋编 1984。《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东明 1952。〈关于改编华校教科书〉，《星洲日报》5月10日。
- 林连玉 2001。《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 林水椽 1998。〈独立前华文教育〉。载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5-254。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社。
- 〈商务五十年——一个出版家的生长及其发展〉。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1992），页764-767。北京：商务印书馆。
- 史春风 2006。《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原放主编 2004。《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宋哲湘著，郑良树编 2009。《宋哲湘华教论集》。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
- 王赓武 2002。《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许苏吾 1950。《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
- 徐中约 2005。《中国近代史（上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阎萍、张雯编 2009。《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北京：语文出版社。
- 郑良树 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 _____ 1999。《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 _____ 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 周聿峨 1995。《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庄国土 2003。《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TAN Liok E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教科书

- 陈慎、杜之坚、曾羨德编 1957。《国语》高级小学（第一、四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 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编 1906。《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一至八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高凤谦、庄俞、沈颐、蒋维乔、戴克顿编 1912。《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第三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华鸿年、何振武编 1912。《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七册）。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 黄展云、林万里、王永忻编 1907。《国语教科书》初等小学（第四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蒋维乔、庄俞编 1904。《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初等小学（第二、三、五、六、七、八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蒋维乔、庄俞编 1912。《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三、四、五、六、八、九、十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联营编辑委员会编 1953。《国语》（一上下、二上下、三上下、四上下）。新加坡：星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 罗良铸、朱文叔、吕伯攸编 1934。《小学国语读本》高级小学（第四册）。新加坡：新加坡中华书局。
-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编 1955-1956。《国语教学法》（二上、三上下、四上下、五下、六上下）。新加坡：新加坡上海书局。
-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编 1955-1957。《初级国语》（三下、四上）。新加坡：新加坡上海书局。
-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编 1955-1957。《高级国语》（五上）。新加坡：新加坡上海书局。
- 沈百英、赵景源、韦恂编 1946, 1948。《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小学（第四、六册）。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
- 沈百英、赵景源编 1949。《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小学（第四册）。新加坡：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 沈百英、吕伯攸编 1956。《国语》初级小学（第七册）。新加坡：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 新加坡南洋编译所编 1957。《国语》初级小学（第七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 星加坡世界书局编译所编 1948。《国语》初级小学（第四、六册）。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
- 朱文叔、吕伯攸编 1951。《小学国语读本》初级小学（第七册）。新加坡：新加坡中华书局。

报章

- 《南洋商报》社论主笔（1952）。〈重编华校教科书平议〉，《南洋商报》4月18日。
- 《南洋商报》，1952.4.27，4.30。
- 《星洲日报》社论主笔（1951）。〈华校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星洲日报》12月22日。
- 《星洲日报》，1952.4.19，4.20，5.7，5.23，6.26。

附录一：马来亚华文小学华文教科书编目（1904-1957）

年份	教科书名称	册	出版社	编者	全册
1904	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初等小学）	二、三、五、六、七、八	上海商务印书馆	蒋维乔、庄俞	十册
1905	寻常小学课本（绘图小学课本）	一	不详	苏州小学堂编辑	不详
1906	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	一至八	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	八册
1907	国语教科书（初等小学）	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	黄展云、林万里、王永忻	四册
1912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	一、三	上海商务印书馆	庄俞、沈颐、蒋维乔、戴克敦	四册
1912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	一至十	上海商务印书馆	蒋维乔、庄俞	十册
1912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初等小学）	二	上海商务印书馆	秦同培	八册
不详	普通适用新国文（初级小学）	二至五	文成书局	不详	八册
不详	共和国新国文	六	商业书馆	不详	八册
1912	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七	上海中华书局	华鸿年、何振武	八册
1914 1928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校高级）	二、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	庄适、吴研因、沈忻	四册
1915 1917	初学国语教科书	一、二	檳城兢兢书局	檳城兢兢书局编辑所	不详
1923 1926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	一、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	庄适、吴研因、沈圻、计志中	八册
1925- 1927	新撰国文教科书	一至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	缪天绶	四册

1933	南洋国语教科书（高级小学）	二	香港商务印书馆	庄适	四册
不详	南洋国语教科书（初级小学）	四	商务印书馆	沈百英	八册
1934	南洋国语教学法（高级小学）	四	香港商务印书馆	胡钟瑞	四册
1934 1935	小学国语读本（南洋华侨学校高级小学）	四	新加坡中华书局	罗良铸、朱文叔、吕伯攸	四册
1935	南洋初级国语教学法	五	香港商务印书馆	沈百英、沈秉廉	四册
1937	小学国语读本（初级）	四、七、八	上海中华书局	文叔、吕伯攸	八册
1939	南洋国语读本（小学初级）	一	众兴出版社	中国教科书研究会	八册
1939- 1948	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	一至八	香港商务印书馆	赵景源、沈百英、韦恂	八册
1941- 1947	复兴国语教科书（高级）	一至四	香港商务印书馆	沈百英、朱慕周、金云峰、韦恂	四册
1947- 1951	小学国语读本（初级）	一至三、五至八	新加坡中华书局	朱文叔、吕伯攸	八册
1948	国语（初级）	一至八	星加坡世界书局	星加坡世界书局编译所	八册
1948	南洋国语教科书（初小）	二	新加坡南洋书局	星加坡南洋编译所	八册
1949	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	一至七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沈百英、赵景源	八册
1949	复兴国语教科书（高级）	四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朱慕周、沈百英、金云峰	四册
1949- 1951	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	一至四	新加坡中华书局	马精武、王志成、卢冠六、俞焕抖	四册

1949-1952	初级国语	一至八	新加坡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	八册
1953-1954	高小国语读本	一、三、四	新加坡中华书局	徐亚倩、朱文叔、吕伯攸、杨复耀	四册
1953-1954	国语	一上下、二上下、三上下、四上下	星加坡联营有限公司	联营编辑委员会	十二册
1955-1956	初级国语教学法	二上、三上下、四上下	新加坡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	八册
1955-1957	初级国语	三下、四上	新加坡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	八册
1956	高级国语教学法	五下、六上下	新加坡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	四册
1956	高级国语	五上	新加坡上海书局	上海书局编辑委员会	四册
1956-1957	国语 (初级小学)	一、三、五、六、七	新加坡中华书局、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沈百英、吕伯攸	八册
1957	国语 (初小)	七	新加坡南洋书局	新加坡南洋编译所	八册
1957	国语 (高小)	一、四	新加坡南洋书局	陈慎、杜之坚、曾羨德	四册

资料来源：整理自田野记录

附录二：马来亚侨校小学禁用之华文教科书一览表（1930-1935）

宣布禁用年份	教科书名称	出版社
1930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新主义国语读本	上海世界书局
1931	新中华国语读本	上海中华书局
1931	新学制适用新小学教科书	上海中华书局
1931	基本教科书国语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新标准国语教科书	上海民智书局
1931	民智新课程小学国语教科书	上海民智书局
1931	新小学国语教科书	上海广益书局
1932	新小学高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三册）	上海中华书局
1932	新小学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七、八册）	上海中华书局
1932	新中华高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三册）	上海中华书局
1932	新中华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五、七、八册）	上海中华书局
1932	新学制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八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	高级小学国语（第一、二册）	上海儿童书局
1932	高级小学国语读本（第一、二册）	上海文明书局
1935	新课程标准现代初小学国文范本（第一至四册）	上海世界书局
1935	新生活高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一、三、四册）	上海大东书局
1935	新生活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第六至八册）	上海大东书局
1935	开明国语课本（初小第六至八册）	上海开明书局
1935	初级小学用儿童南部国语（第五、六、八册）	上海儿童书局
1935	初级小学用儿童北部国语（第二册）	上海儿童书局
1935	初级小学用儿童中部国语（第七册）	上海儿童书局

资料来源：本表资料综合郑良树（1999：206-207，216-218，220-222）与周聿峨（1995：128-130）而成。